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人生本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
每个人的生命史
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主编：邓九平

谈人生

五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人生本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
每个人的生命史
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谈人生

大众文艺出版社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主编：邓九平





民主与科学

庞朴

中国文化名人评点

685

民主精神是18世纪理性主义的产物,具有唯心倾向;而科学精神是19世纪经验主义的产物,具有唯物倾向。相隔一个世纪,其基本倾向也不一致。民权主义、民主精神强调人的本性、人的独立与解放以及人的作用。在文学领域相应地出现了浪漫主义思潮。强调民权走向极端,随之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国家的无政府状态。19世纪的科学主义就是对于民权主义的反拨,它强调观察、强调经验、强调唯物、强调按部就班、强调数学计算。而民权主义与科学主义二种精神在当时五四时期的思想旗手们的口号里面是并提的。陈独秀如此,胡适也如此。不仅如此,在谈到民主、科学的文章中,陈独秀有一篇1915年底写的文章《一九一六年》,对青年提出了两个要求。他认为1916年的青年应该:

1. 自居于征服的地位,不要居于被征服的地位,应该好勇、狠斗,不为势力所屈服;
2. 尊重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不作他人的附属品。

这两个要求本身就是矛盾的:自居于征服者的地位就是把别人看成是被征服的对象;而第二条尊重个人的独立自主与人格要求、不做他人的附属品,则不允许被征服。这两条要求与西方18、19世纪民主与科学的思潮倒是一致的。其中第一条与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思想相一致,他们就是自居于征服者地位,把征服别人当成自己的责任,是替天行道。第二条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天赋人权的思想的反映。两种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在陈独秀



文章里就拿到一起采用了，他发现不了这个矛盾，只要它们每一种思想有其合理的地方，不管二者在体系上如何对立，只要有真理的成份，都可以同时拿来，这便是中国兼容并包思想的反映。

1987 年

忧乐圆融

圆融既被推为儒道各自学说的最后一言和人格的最高境界，于是两家虽仍存有偏忧偏乐的差异乃至对立，恰好成了检验他们的学说能否贯彻到底和考验他们的人格能否臻于至上的试金之石。所以，他们走了“仇必和而解”的光明大道，互相圆融起来建成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而将偏至旁行者及其彼此的坚决斗争到底，视为末流了。

圆融也成为一种优势，使得中国文化能顺利迎接外来的佛学，不因它的迷狂和辨析而盲从和自馁，相反却以圆融去容纳和包涵，论证和充实，并终于汇成了源远流长的、雄峙东方的忧乐圆融的中国人文精神。

这是一种“精神”，不同于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精神是受到称道和景仰的集体意识，它代表着这个集体并培育着这个集体，凝聚着这个集体也传承着这个集体，它不是先验的，既不先于这个集体的经验而为人的本性或天道所固有，也不先于每个个人经验而由这个集体的族类所积淀，它源于生活并塑造着生活，来自历史也构成着历史，保存在传统文化之中并流衍而为文化传统。它既有内容也有形式，既有结构也发生功能，既受精英所仰止也为



百姓所追求，并且达到圆融的状态。

这个人文精神作为文化传统，铸就了我们民族的基本性格。它在各个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变异，呈现为不同的时代精神。但在近代以前，变化是不大的。时至今日，它正迎接着新的挑战。我们相信，正是圆融本身，可以促使它不泥于一曲：不止于故步，不扬彼抑此，不厚古薄今；可以保证它取长补短而不崇洋媚外，革故鼎新而不妄自菲薄；适应时代而不数典忘祖，认同自己而不惟我独尊。

我们久已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应该敬重这种精神，我们正在发扬这种精神。

1990年11—12月于北京柳北居

1991年2月修订

中国
文化
名人
文集

忧患意识

687

“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先生于1962年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提出的；翌年，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讲演中曾予阐释。

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其基本动力便是忧患意识。此前之“尚鬼”的殷人，沉浸在原始的恐怖与绝望气氛中，总是感到人类过分渺小，一凭外在的神鬼为自己作决定；因而人的行动脱离了自己意志主动或理智导引，没有道德可言。周人革掉殷人的命，成为胜利者，并未表现出趾高气扬的架势，相反，从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历史嬗变中，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有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取词于《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某种欲以己力



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是人对自己行为的谨慎与努力。因而这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确立其主体性之始,它引起人自身的发现,人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进;与形成耶、佛二教的恐怖意识和苦业意识绝然不同。忧患意识在周初表现为“敬”,此后则融入于“礼”,尔后更升进为“仁”。从表面看来,人是通过“敬”等工夫而肯定自己的;本质地说,实乃天命、天道通过“敬”等工夫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身上,作为人的本体,成为人的“真实的主体性”。他们相信,基于忧患意识为基础的心性之学,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品格,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孔孟老庄以至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化了以后的佛学的一条大纲维之所在。(见《中国人性论史》第二章、《中国哲学的特质》第二、三讲及《徐复观文录(二)·中国文化复兴的若干观念问题》)

忧患意识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恐怕不在于身居“困难的处境”时,“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如徐复观所强调的那样;而在于,一种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据记载,当着真的陷入困难的处境时,如孔子畏于匡、颜回居陋巷那样,儒者倒会显出一副乐天知命的神情,达观起来,而找不到此时此地有任何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相反在并不困难的处境,在相当顺利的时光,才是忧患意识大行其道的场合。所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得而不忘丧;这些所不忘的危忘乱丧,便是“忧患”,而能不忘,便是“意识”,对忧患的意识;而在安存治得的顺境中,具有忧患意识,便是一种理性精神,一种基于对人生和宇宙的透彻了解、并为理想之实现而动心忍性的智慧,或者说,是融合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于一身的理性精神。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点全在一个“如”字上。未临深渊而如临,未履薄冰而如履,这才叫忧患意识;真的临深而履薄了,斯时需要的便不再是忧患意识,而恰恰是它的对立面——临危不惧、履险如夷、乐以忘忧之类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了。因为按照儒家的辩证法,忧患之作



为真正的忧患，或忧患的本体，并不在忧患者之中，倒是在它的对立面，在安乐者之中；一旦安于所安，乐于所乐，真正的忧患便开始了，临近了。所谓死于安乐，所谓阴不在阳之对、而在阳之内者是也。

忧患意识说者放过了儒家思想的这一精髓，放过了自律之忧而强调他律之忧，买椟还珠，殊为可惜。联系到他们的花果飘零之感，他们的蔽于危而不知安的处境，人们还是能够体谅的。

1990 年



忘不掉的闲谈(二则)

姜德明

“文革”当中,王冶秋同志奉周总理之命从干校归来,主管文物工作。他甘冒风险地吸收了很多所谓旧文化部的人来工作,同时闻讯而找上门来求职的人也不少。人们急于为国家效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时每天夜里和假日,他在家里也不得安宁。所以一到星期日,他就躲到大女儿家去,我住的地方距他女儿家不远,彼此可以谈点文学和鲁迅,因此他常到寒舍来坐坐,偶尔还在这儿吃顿包饺子。

我们闲聊了大大小小的很多事。

他跟我说,一生中最使他心灰意冷的,是军宣队让他到湖北农村安家落户。到了目的地的那天夜里,他整宿没有合眼。天很冷,他点燃了劈柴,望着那堆毫无希望的火焰在发呆。心想:这一生难道就此结束了吗!

回到北京后,他也未必能完全放手工作。

有一次,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收进清华大学处理的一批线装书,其中还有不少是刘半农的藏书。我和冶秋同志去看了。我买了几册有刘氏签名的书,他为公家挑选了若干册与文物有关的,如研究玉器和金银首饰器物的书。隔了些日子,我同他谈起那些书,他不无气忿地说:“管事的军宣队、工宣队的某人,以为花钱买这种老古董毫无用处!他不批钱,我也没有办法。”而名义上,冶秋同志还是图博口的负责人。



忽然江青指名要见冶秋同志,事后他对我说:“哎哟,真是受宠若惊呀!去见她,还不知道是祸是福呢?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到了那里,要我为她印《红楼梦》的一种版本。我如释重负地连忙声明,这事不属我管,是出版口的事。我可不敢高攀这个关系。”这些话现在听来极平常,可在当时正是江青不可一世之际,冶秋同志却毫不掩饰对这个“女皇”的反感。承冶秋同志对我信任,他知道我不会泄露这消息。

我不懂文物工作,有一次我说到鲁迅给韦素园写的墓碑,按说也是珍贵的文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冶秋同志竟利用假日,一个人到西郊的万安公墓去查访那块墓碑的下落,那是1974年春天的事吧,他跑来跟我说,他先找到了李大钊同志的墓碑,上面已留下刀斧砍凿的裂痕,是红卫兵干的。他没敢在那里久留,因为人们正围着李墓在开批林批孔的大会。他以为实在莫名其妙。接着便在墓地寻找韦素园的墓。墓已平掉了,他只好根据旧时的记忆,按照大致的方向反复踏访。老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发现脚下半埋在土中的一块垫路的石板,正好是鲁迅先生书写的韦氏墓碑。好极了!他回来以后,马上通知了鲁迅博物馆。可怜得很,那时鲁迅博物馆连一辆平板三轮车都没有,更不要说汽车了,冶秋同志又打电话给北京市文管处,请他们帮忙出车,把墓碑挖出来,送到鲁迅博物馆去;事成之后,他满意地舒了一口气说:“真要谢谢文管处的同志们!”可是,我们还应该感谢谁呢?

在“四人帮”制造的文化大地一片空白的时代,人们忽然在书店里可以买到鲁迅先生的手稿选集和书信墨迹了。这在当时堪称奇迹,可是有谁知道这也是冶秋同志一手操办的。我保存了1971年10月31日深夜他写给我的一封信:

“我有一个大计划,可惜不见得能实现。拟将鲁迅所有手稿、墨迹、书信都影印出版。……现在全国各地



手稿若影印出来,对于原稿可不再翻动,无论从备战或普遍能看到手稿都是大好事。可惜现在文物出版社已拆得七零八落,实现这一计划还须作很大努力。……北图就有鲁迅手稿八百页,抄得十分整齐,这是鲁迅亲自抄写的,去年竟在一个破庙中‘战备’,潮湿虫蛀,马上抽出放在北图的保险柜中作为特藏。但这些只是藏起来,总不是办法。想最近能向全国图书馆、博物馆发一文,调查一下鲁迅手稿墨迹情况,但能否实现,也还是问题。改日再面谈吧!”

请问,在当时恶劣的处境下,有谁能够作出这样具有战略眼光的考虑!记得当时他跟我说,当他到了北城的柏林寺,把手伸进了木箱,摸到鲁迅先生的手稿已经有些潮湿的时候,他立刻火冒三丈……请原谅这位老局长一时的脾气暴躁吧。

闲谈时也曾谈到过他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的某些往事。抗战胜利后,他接受党的派遣,在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少将参议。那时国防部演剧二队亦在北平。一个演剧队的朋友约他某晚到东华门大街的真光电影院(现为中国儿童剧场)去看话剧,只要在开场前穿着少将军服在前排坐一会儿即可。冶秋同志了解这位同志的政治面貌,他觉得这事并不太麻烦,便照办了。事后党组织跟他说,以后再别这么大意了。尽管演剧二队地下党的力量很强,但终究是在敌人眼皮底下从事秘密工作,稍有半点马虎便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他一直也没有弄清楚,当时对方何以要他全副少将武装地出现在剧场里、但是他虚心地接受了组织的意见,并作为一个教训跟我谈了。说真的,当时我听了,以为这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冶秋同志那种认真、失悔的样子却使我深为感动。

1947年9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冶秋同志所联系的一个直通党中央的电台被国民党破坏,他不得不连夜逃离北平。在这次非



常事件中，他不怎么谈自己的惊险传奇故事，却总是记挂着三个人对他的帮助，一是感谢吴晗教授为他换装，并安排他脱险到天津；二是只有书信往来，从未谋面的天津大公报的副刊编辑劳荣，冒着危险留他住了一夜；三是他身边的那位忠诚于他的勤务兵。当特务来抓冶秋同志扑了空时，便把勤务兵抓走，可巧冶秋同志又与特务们走了个碰面，当时的情况万分惊险、而那个勤务兵却沉着地装作根本不认识他，低头擦肩而过！多年来冶秋同志一直感念这位勤务兵，四处寻找他。他是自己的同志呢，还是仅仅出于一种正义感而有如此举动？至今也没有得到答案。我相信直到冶秋同志病倒在床上，甚至连话也不能讲了，一旦他头脑清醒时，也许还会想到那个救他一命的普通士兵。革命是艰难的，有时得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革命也离不开众多人的支持，如果没有了群众，还能谈什么革命！我似乎理解了，为什么冶秋同志常常会和我谈起他所想念的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普通人。

在我同冶秋接触的日子里，我没有感到他是一位作家，或者是一位文物专家，更不是什么高人一等的长官。他普普通通，一如常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这鲜明的印象早已留在我的记忆里。如今我多么怀念他，还有我们那种无拘无束的闲谈！

冯友兰佚文

有件事我时常挂在心上。几年前我在主持出版社工作的时候，编有“百家丛书”一种，已出十多本。在梁漱溟先生的《勉仁斋读书录》问世后，即与宗璞女士联系，拟出冯友兰先生的一本。她与冯先生商量后愉快地答应了。可惜因环境有变，又加上我已届退休年龄，也不想超期服役了，便拖了下来。后来更无权过问此



事。近来有家出版社拟出学人随笔，我力荐他们去找宗璞，果有所成，我的心事也有了着落，觉得分外轻松。我一向认同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有些史家的文笔也不比作家差，更何况史家注重实证，不尚空谈，他们的短章小札总是同智慧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比某些空幻无物的作家随笔要耐看和有益。

日前翻查资料，顺手拿起一本《李峻之遗著》，1933年由清华人自费印行，封面题签者顾颉刚先生，题序者冯友兰先生，作跋者吴晗先生。逝者李君河南南召人，大革命时代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被捕，出狱后于1930年到清华大学史学系，从陈寅恪、蒋廷黻学，1933年病歿于协和医院，年仅25。《遗著》中收李君的《周代西方民族之东殖》、《三恪考》等著译5篇，附钱穆先生的《重答李峻之君对余〈周初地理考〉之驳难》，文前又有钱氏的长篇说明，实亦纪念李君的文章。我怀疑钱氏文集中未必收录这篇说明。钱氏当时在清华讲东汉史，李君亦是受业的学生，弟子敢于向老师挑战，作《评钱穆先生周初地理考》。师生学术见解有异，但老师赞赏李君“果恂恂诚笃好学之青年也”。《遗著》保留了师生之间的争论文字，体现了高等学府自由的文化空气。至于冯友兰，顾颉刚先生的举动自然也显示了前辈提携后进的精神。因想宗璞女士处未必存有此书；冯序又很短，特抄录如后，顺供世人一鉴。

凡世之成大功，立大名者，必具非常之才，有非常之志，又必享相当长寿，以成其志，而尽其才。《中庸》：“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实则非有大德者必得其寿，乃得其寿者始能成大德者，孔子云：“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不假年则欲学而不得，甚矣其言之悲也。李峻之君为余故人黄卓璋先生之女婿，可谓具非常之才，又有非常之志者，而竟早死。其友人集其平日所学为学术论文为此编，余未知其果能传否也；



庶几世之爱才者，见此编，知有此早丧之英，与其友朋同声一哭耳。传此编果存，李君亦岂料其竟只以此数文显哉，悲夫！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冯友兰

吴晗的跋较长，写于1933年10月，本书印成当在年底，或下年初，本书之得以编成问世正是吴晗主持的结果。经查近年出版的四卷本《吴晗文集》，未见收录此跋，连张守常教授编制的吴氏著作年表亦无著录，旧存一本残书至少提供了冯、吴二氏的两篇佚文，此亦吾辈喜藏旧书，抱残守阙者的安慰也。

1996年11月



爱真理

王梓坤

真理的力量无穷，捍卫真理的勇士不可战胜。残暴凶狠的黑暗势力可以杀害个人，却永远不能阻挡真理的车轮滚滚向前。

残暴只能破坏，创造和建设则需要勤劳与智慧。

公元4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女天文学者伊巴蒂，为了研究天体运行，被基督教僧侣指控为妖术，终于惨遭撕死。疯狂的迫害延续了千多年，新教徒和罗马教徒在搜罗“妖人”上互相竞赛。某人被告发后，如果他自认有罪，就会立即处死，除非他捕风捉影地出卖别人，也许可以减轻刑罚。如果不认罪，他就必须忍受各种酷刑，直到牺牲为止。总之，死是很难幸免的。那时，真是人人自危，不知哪一天会大祸临头。据估计，欧洲在15~16世纪的两百年间，被指为妖人而遭惨害的，为数达75万人以上。

1600年，又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布鲁诺惨案。意大利的布鲁诺(G. Bruno, 1548~1600)，具有先进的宇宙观，他积极宣传哥白尼的日心地动学说，并且比哥白尼还前进了一大步。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不过是无数恒星之一，宇宙中可以居住的星球也是无限多的。在他的著作《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中，有一首诗表明了他的观点：

展翅高飞信心满，晶空对我非遮拦，
戳破晶空入无限，穿过一天又一天，



以太万里真无边，银河茫茫遗人间。

他的学说触犯了《圣经》上的教条，耶稣教会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被迫流亡国外多年，1592年回到意大利，不久被一个绅士出卖给宗教裁判所。1600年3月17日，教会以极其野蛮的手段，火焚布鲁诺于罗马的百花广场，罪名是他不仅是一个“异端分子”，而且是“异端分子的老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漫长的七年监狱生涯里，布鲁诺英勇顽强，毫不妥协，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断然拒绝要他放弃自己的观点就可得到宽大的诱降劝告，并且公开揭发了教会的黑暗，卑鄙和无耻。1599年10月21日的档案记录中说：

“布鲁诺宣布，他不打算招供，他没有作过任何可以反悔的事情，因之也没有理由去这样作……”

其后，政治迫害愈演愈烈。

恩格斯说：“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乔尔丹诺·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自然辩证法》）

697

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科学家，他们以为用残酷手段，就能阻止真理的传播，阻止科学文化的发展，真是大错而特错。事实证明，凡是这类暴行，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这可算是一条历史规律。越镇压，真理就传播得越迅速、越广泛。霍尔巴赫在《袖珍神学》一书中有一段批判他们的绝妙的文字：

“不信教的人……用他们凡人的眼光只看见我们神圣的教会里无非是一些愚人蠢事，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在其中发现一个愚蠢地让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愚蠢上帝、一批愚蠢的使徒，一些愚蠢的奥秘、愚蠢的见解。愚蠢的争论以及一些由蠢人们来举行使远非愚蠢的憎



侣得以生活的愚蠢仪式。”

热爱真理，忠于人民，不畏残暴，不怕困难，是科学工作人员应具有的优秀品质。布鲁诺和一切献身于真理、献身于人民、献身于革命事业的英勇战士，是人类的鲜花，他们的精神浩然长存。滔滔江水，巍巍青松，真理之光，不可灭焉！

真理的海洋

——谈 勤 奋

追求真理，其乐无穷。多少科学工作人员在困难的环境里度过艰苦的一生，却始终矢志不移，为真理而献身。进化论的先行者拉马克(J. Lamarck, 1744~1829)，家贫，一辈子刻苦勤学，与天奋斗。他在《动物学哲学》一书中热情地说：

“观察自然，研究它所生的万物；追求万物，推究其普遍或特殊的关系；再想法抓住自然界中的秩序，抓住它进行的方向，抓住它发展的法则，抓住那些变化无穷的构成自然界的秩序所用的方法；这些工作，在我看来，乃是追求真实知识惟一的法门。这等工作还能予我们以真正的益处；同时，还能给我们找出许多最温暖、最纯洁的乐趣，以补偿生命场中种种不能避免的苦恼。”

拉马克在科学上为人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建立了生物的种可以发生变异。有机体适应外界条件而发展以及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等学说，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的生物进化的思想。然而社会却对他冷酷无情，他晚年双目失明，靠幼女笔录，坚



持工作；死后连坟地也买不起，以致后人凭吊时找不到他的墓。我们今天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应奋发图强，为人民积极工作，至死不息。

永不满足的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火一般地追求真理的愿望，炽热地对待新事物的态度，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是科学工作者不可少的重要品质。科学巨匠牛顿(I. Newton, 1642~1727)说：“我不知道，在别人看来，我是什么样的人；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不过就像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为不时发现比寻常更为光滑的一块卵石或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却全然没有发现。”

在力学三定律的确立中，在万有引力的发现中，在光的微粒说以及微积分的创建中，他的贡献是关键性的，但他毫不满足，面对真理的海洋，对后人寄予殷切的希望。他伫立在当时科学的最高峰，眼界辽阔，站得愈高，发现的问题也愈多，与未知世界的接触面就愈广，因而追求真理的心情也就愈迫切。

牛顿的成就，主要是靠辛勤劳动取得的，而不全是倚靠天才。这可举他的助手牛顿的话为证：“他很少在二三点钟以前睡觉，有时到五六点，……特别是春天或落叶的时候，他常常六个星期，一直在实验室里。不分昼夜，灯火是不熄的，他通夜不眠地守过第一夜，我继续守第二夜，直到他完成他的化学实验。”牛顿如此，其他在科学上作出贡献的人也往往如此。达尔文曾说过，他自己“所完成的任何科学工作，都是通过长期的考虑、忍耐和勤奋得来的。”

爱迪生说过：“发明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这句话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